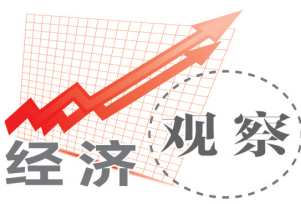


推动金融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

□ 原 磊



怎么看·怎么办

近期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》，为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。其中，专门提出“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”，强调金融要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。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，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。金融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，必须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对金融体系的新需求，有针对性地推动金融体系转型发展。

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金融体系的需求特征

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，由技术革命性突破、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、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，将带来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的持续涌现。对于金融来讲，服务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加强对创新活动的全方位支持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。具体来看，新质生产力的金融需求呈现出四个方面特征。

一是归集长期周期、高风险容忍度的耐心资本。匹配科技创新长周期研发、前期亏损的特征。科技创新具有典型的“J曲线”特征，前期往往需要持续多年的高强度研发投入，经历较长亏损期，技术成熟和商业化之后才可能迎来收益的集中释放。据研究，一项前沿技术从基础研究到规模化商用，周期往往在10年以上。为支持科创企业的发展，必须有大规模、多元化的耐心资本，不以追求短期收益为首要目标，而是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潜力和技术创新，并容忍较高的投资风险。从类型上看，耐心资本大致可分为股权型和债权型。股权型耐心资本以政府引导基金、产业战略投资为主，适合科创企业早期研发；债权型以政策性长期贷款、科创长期债券为

主，支持产业化落地。此外，基金载体型通过母基金、产业基金汇集各类长期资金，也能够实现专业化运作。

二是识别无形资产与技术价值，激励企业持续加强长周期技术攻关。科创企业的核心资产是专利、数据、算法、人才团队等无形资产，轻资产、缺抵押是其普遍特征。以传统财务指标看，这类企业往往呈现“高研发、高亏损、高不确定性”特征，按既有授信模型很难获得与其真实价值相匹配的资金支持。为激励企业持续加强长周期技术攻关，必须对科创企业进行合理估值，形成能够反映专利质量、技术壁垒、研发投入、技术转化潜力的价格信号。允许企业在短期不赚钱但技术持续迭代的情况下，依然可获得相对合理估值，引导资本做长期创新投资。要生成全生命周期的多层次价格信息体系，不能只有二级市场股票价格一套标尺，需要一级市场估值、公开股权市场、债券等价格信息互相配合，形成完整价格谱系。

三是适应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，持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。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区块链等智能技术正在深刻改变金融的供给方式和触达能力。依托大数据构建用户画像，借助人工智能强化智能分析与决策能力，利用区块链搭建多方可信协作基础，能够拓展金融的能力边界，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流向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域。同时，新质生产力发展也对金融的数字化、智能化水平提出了紧迫要求。传统金融系统多为分散建设，数据孤岛突出、算力不足、业务迭代慢，难以支撑大数据风控、智能业务、区块链可信协同等新型金融服务。为更好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，要重构底层技术底座，推进云原生、分布式架构建设，打通内外部数据链路，夯实算力、存储、安全基础设施，对核心业务系统迭代升级，把智能化嵌入信贷、支付、风控、资管等全流程。

四是科学设置风险分担机制，完善符合风险规律的治理模式。不同金融制度实现风险分担的方式不同，银行体系主要是跨期风险分担，通过长期融资、内部消化风险来实现跨期平滑，更适配大型企业和成熟型经济，而市场主导体系主要是跨截面风险分担，通过证券化、衍生品等工具，把风险分散给大量投资者，更适配创新驱动型经济。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，必须充分认识创新驱动的高风险性，科学设置风险分担机制，避免风险错配。技术研发、中试阶

段高风险主要由股权类机构承担，减少把技术失败风险过多转嫁给商业银行，而商业银行则重点服务已经完成产业化的科创企业。同时，要大力发展长期科创债券、长期股权工具，减少短期信贷匹配长周期研发项目带来的期限错配。

多措并举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

提高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质效，关键是要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金融体系的需求特征，更好发挥金融在资金融通、资源配置、支付清算、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功能，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。

完善多层次投融资体系，培养壮大耐心资本。针对科创企业早期资本短缺的突出矛盾，从制度供给入手培育耐心资本。一是优化政府引导基金运作机制，实行长期考核与分类考核，适度提高容错容亏比例，允许对单个项目设置更高的风险损失容忍度，避免“行为短期化”“明股实贷”等情况。二是培育多元化创投经营主体，鼓励保险资金、社保基金、企业年金等长期资金以合规方式参与创业投资，丰富创投基金募资金来源。2024年我国养老金总规模约15.7万亿元人民币，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。随着我国养老金融的快速发展，养老基金可成为耐心资本的重要来源。三是畅通退出渠道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机制，丰富并购退出、S基金等多元化退出方式，形成“募投管退”的良性循环。四是规范发展“投贷联动”“投债联动”，允许有条件的银行系投资子公司与信贷、承销业务形成风险收益共享机制。

优化科创企业估值体系，从传统财务指标转向融合技术、产业与生命周期的多维动态评估。科创企业估值需要考虑多维因素，包括企业的自身竞争力和企业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角色作用；不仅要考量当前发展绩效，而且要考量未来发展潜力。从技术维度来看，要重点看专利数量和质量、技术路线先进性，以及核心技术的不可替代性等。从产业落地与商业化维度来看，要重点看技术成果产业化、产品落地、下游客户验证情况，以及营业收入、现金流等。从战略安全与产业链价值维度来看，要重点看支撑国家战略、服务科技自立自强、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实际贡献，以及解决“卡脖子”问题的实际成效等。从创

新治理维度来看，要重点看企业研发机制、知识产权管理、科研投入持续性、产学研协同成效，以及研发和管理团队的素质能力等。从风险维度来看，要重点识别技术迭代风险、技术路线失败风险，以及行业竞争情况和市场替代品等。

发展数字人民币，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支付清算结算平台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支付清算体系提出了系统性重构要求。在场景上，要求适配数据、算力、知识产权等无形新型要素交易；在主体上，要求满足轻资产科创企业、产业集群多级账户与分账需求；在时效上，要求实现7×24小时、高并发处理，秒级到账；在管控上，要求将支付嵌入产业流程，支持智能合约，实现资金用途可核验可追溯；在跨境上，要求本币清算自主可控。数字人民币作为法定数字货币，能够实时清算、全天候运转，具备可编程、智能合约能力，同时具有自主可控的底层基础设施，能够保障产业链供应链支付安全，因此可成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。随着数字人民币进入2.0时代，新的计量框架、管理体系、运行机制和生态体系正式实施，存款、支付、结算一体化进一步强化，有效提升了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能力。为此，要降低应用转换成本、加强智能合约标准化建设、扩展应用场景、加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建设、健全法律监管制度，为数字人民币广泛应用创造更好条件。

建立动态风险监测体系，加强全周期风险管理。创新活动本身就具有高风险性，一项技术路线失败可能引发连锁的估值崩塌和信用违约，单靠传统的事后风险处置和抵押物清算难以奏效，甚至可能在市场恐慌时加剧风险的自我强化。为此，要建立覆盖企业研发进度、试验结果、订单变化等先行指标的动态风险监测体系，把风险管理嵌入项目全生命周期，做到早识别、早预警、早暴露、早处置。发展投贷联动、银保合作、风险分担基金等机制，通过资产组合分散和风险共担，平滑单一项目失败对金融体系的冲击。对处于不同技术成熟度阶段的企业和项目实施差异化风险管理策略，防止因过度收紧而误伤处于研发关键期的优质企业，也防止盲目跟风、一哄而上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。

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）

平台经济是数字时代极具活力的经济业态。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明确提出，“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健康发展，加强平台企业数据、算法、流量和规则监管，促进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、劳动者共赢发展”。今年7月，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，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。这一系列顶层设计与战略安排，为提升平台经济发展能级、完善平台治理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。

近年来，平台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。数据显示，我国已连续13年稳居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地位，2025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5.2%，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36.2%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，占职工总数21%，规模持续壮大。平台经济依托网络效应与规模优势，在扩容消费空间、降低交易成本、吸纳灵活就业、赋能中小经营主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但值得关注的是，平台经济在展现巨大发展潜力的同时，也在治理水平、平台生态等方面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。随着流量红利逐步收窄，市场由增量开拓转入存量博弈阶段，平台经济随之显现出竞争“内卷化”、治理体系滞后于新业态发展等问题。例如，部分平台企业过度依赖补贴让利等“内卷式”手段争夺存量用户，而非通过技术创新创造增量价值。在这种竞争态势下，商家被迫卷入持续的低价博弈，难以顾及及产品升级与品质提升，并且这种“内卷式”竞争还会向产业链上下游传导，造成行业整体创新意愿下降，扭曲资源配置，挫伤平台各主体发展信心。此外，平台生态内部利益分配机制尚不健全，中小经营者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生态体系中的话语权不足。与此同时，部分平台将发展重心放在存量用户争夺，未能协同生态伙伴共同创造增量价值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平台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内生动力。

面对新形势新挑战，加快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，必须把握好规范治理与提质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，从多个维度协同发力，引导平台经济健康发展重心转向价值共创，构建公平有序、富有活力的平台经济发展新格局。

完善平台常态化监管体系，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秩序。一方面，构建灵敏高效的事前风险防控制度。针对垄断、不正当竞争等突出风险，搭建常态化风险研判评估模型，对平台经营活动、数据流转、市场竞争态势开展动态监测与提前预警，增强监管工作的靶向性与前瞻性。持续健全平台经济领域的法治体系，清晰界定平台企业在市场竞争、数据管理、权益保障等领域的主体责任，强化市场准入、数据采集、算法应用等重点环节的合规审查。强化平台经济标准化专业支撑，加快补齐平台合规、服务安全、商品质量等领域标准供给短板，引导平台建立内部合规管控体系，畅通消费者、劳动者维权诉求渠道，构建“政府明晰规则、平台落实主体责任、社会多元参与监督”的治理格局。另一方面，推进数字技术支撑的穿透式监管建设。运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数字化工具，搭建跨部门、跨层级、跨地域的监管体系。依托对交易记录、用户行为、算法运行等多源数据的深度解析，精准甄别异常交易、数据违规使用、算法不公等隐蔽违规行为。面向智能应用新业态，积极探索“触发式监管”“沙盒监管”等新型监管模式，依托数字化监管手段提升风险识别能力，以智慧监管实现包容审慎监管目标。

引导平台赋能实体经济，夯实新质生产力培育根基。一是推动平台数字能力向产业端下沉释放。依托大模型、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，提升平台面向制造业、服务业等实体经济输出数字化服务的能力，按需提供算力调用服务，开发适配产业场景的平台算法方案。二是引导平台调整资源投入方向，减少消费端存量流量的争夺，将更多资源投向产业数

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

□ 王 轶

字化改造，把平台数字优势转化为产业升级动能。三是打通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联动通道。支持平台面向产业场景搭建数字化服务体系，推动平台从流量运营转向产业价值创造，培育数实融合新业态，在此过程中要配套激励机制，稳定平台长期经营预期，引导平台与实体企业协同成长，依托数实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。

统筹平台发展与安全管理，筑牢数字领域安全防护底线。一方面，健全平台全链条数据安全管控体系。压实平台数据安全主体责任，规范数据采集、存储、流转各环节管理，完善内部风险防控制度，强化算法安全可靠评估，有效对冲海量数据、智能算法集中带来的系统性安全风险，严防数据泄露、数据篡改等安全事件。另一方面，构建数字风险预警与动态处置体系。健全针对平台新业态的常态化监管研判机制，持续跟踪研判AI智能体、数字人直播等新业态衍生的网络与数据潜在风险，明确业务创新探索与数字安全管控之间的安全底线和边界，做到创新有边界、安全有红线，保障平台经济在安全可控的轨道上持续稳定运行。

构建平台良性共生生态，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共赢。推动平台与经营者形成互促共进的良性经营生态。引导平台面向入驻商户搭建轻量化经营赋能体系，为中小商户提供运营配套支持，助力商户降低线上经营成本，支持商户深耕产品品质，打造差异化供给。鼓励平台搭建商户交流协作通道，推动经营经验的互通共享，支持中小经营者稳定经营、持续成长，夯实平台生态的产业根基。健全生态内劳动者协商共治与权益保障机制。建立影响劳动者权益的算法重大调整前置听证制度，凡涉及劳动强度、休息保障、计酬规则的算法迭代，组织工会、劳动者代表共同开展听证评估，评估通过后方可落地上线。将集体协商成果嵌入平台的用工规则中，赋予工会、劳动者代表对用工算法关键参数的核查权限，避免平台单方随意调整，筑牢劳动者权益防护屏障，构建起“平台赚钱、商家盈利、劳动者共赢”的良好生态，为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生态保障。

积极探索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的实践路径

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增强“国家队”意识、勇担“国家队”使命，跳出教育看教育、立足全局看教育、着眼长远看教育，紧贴强国强军需要，求真务实、真抓实干，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，努力培养一流人才、创造一流成果、作出一流贡献，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。

完善育人体系，提升人才培养质效。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，统筹推进育人方式、管理模式、保障机制改革，加快提高人才自主培养水平和质量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，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，传承红色基因、赓续红色血脉，加强思想引领、成长服务、实践淬炼，引导学生感党恩、听党话、跟党走，立大志向、上大舞台、入主战场、干大事业，全力续写英才涌现、报国建功的育人新答卷。持续优化完善人才培养模式，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设计培养体系，构建导向明确、破除专业壁垒、跨学科体系的培养方案，深化本硕博贯通培养改革，建强拔尖特色班等人才培养特区，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，打

造精品课程、精品教材等课程资源，持续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。着力强化卓越工程师培养，深入推进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，持续深化工程硕博培养改革，完善产教融合组织模式，建强“双师型+项目驱动”的卓越工程师培养共同体，构建“高学历学位论文+高质量实践成果”双重评价驱动机制，引导学生扎根重大工程、重大任务、重大型号一线攻关，把标志性科技成果产出在国之重器上。

优化学科布局，建设一流学科生态。聚焦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，持续优结构、强交叉、建高峰。立足国家战略，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急需学科，系统布局无人反制、量子科技、脑机接口、具身智能、工业智能软件等国家急需学科，加大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孵化，在一流学科培优行动中加大对基础学科支持力度，提升与国家战略需求、科技发展的匹配度。立足办学底蕴、资源禀赋和区域定位，聚焦前沿科技创新，整合优质资源，打造一批辨识度高、竞争力强、服务精准的特色学科集群，塑造学科特色核心优势。推动学科内涵迭代更新，坚持传承和创新并重，促进传统学科与时俱进提质升级，持续夯实学科核心竞争力。持续完善快速响应、有效适配、前瞻布局的学科调整机制，科学制定学科“并转撤”评价

标准，对国家战略需求契合度不高、发展缓慢的学科常态化调整，推进学科结构不断优化。

聚力科研攻关，增强科技创新供给。坚持“四个面向”战略导向，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。加强基础研究，从国家急需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，重点布局深空、深海、深地等战略领域前沿基础研究方向，着力布局紧扣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命科学等基础前沿方向，强化布局人工智能与材料制造、电子信息、网络安全等领域融合发展的前沿交叉研究方向，一体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。深入开展“从1到0”重大工程基础科学问题研究，注重从重大装备瓶颈中凝练科学命题、从国防重大型号中提炼理论问题，培育引领行业的应用基础研究成果。聚焦最前沿、最尖端、最急需领域，强化项目、平台、团队的一体化建设，以重大项目为牵引，联动科研院所、行业领军企业组建攻关联合体，整合创新资源、汇聚攻坚力量，攻克“卡脖子”技术难题。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，升级基础科研平台和科技基础设施，加强数据、工具等创新要素供给，推动人工智能在科学发现、机理揭示、实验优化和工程验证中的深度应用，提升科研原创力、战略贡献度。坚持以产业需求为牵引，探索“政府支持、校地共建、

产学研联动”模式，推动大学科技园建设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从高校单向“自转”转向产学研协同“共转”。持续深化“三项改革”，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，着力把实验室里的“关键变量”转化为产业一线的“最大增量”，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，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、服务推进新型工业化。

健全体制机制，提升支撑保障能力。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健全体制机制，以评价改革为牵引、资源配置为抓手、制度供给为保障，激发服务国家战略的内生动力。分类完善评价体系，树牢服务国家战略的价值导向，坚持以创新价值、能力、贡献为标尺，破除“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”的倾向，让一切办学活力竞相迸发，让一切创造源泉竞相涌流。优化资源配置，统筹高校、科研院所、行业企业等各类科教资源，动态调整资源投向和配置方式，推动资源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、原始创新突破、重大任务攻关、优势学科建设倾斜，凝聚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整体合力。强化政策联动，统筹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、科研创新、考核评价、资源配置等制度建设，形成相互衔接、协同配套的制度体系，持续释放制度效能，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提供坚实保障。

（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）